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为高校中国文化史课程的配套教材。全书在介绍中国文化史知识的基础上,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着力培育大学生的民族精神和审美情趣,从而树立正确的文化价值观。本书集知识性、趣味性与时代感为一体。全书共分为八章。主要内容有:中国古代文物评价与欣赏、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国古代哲学与宗教、中国古代的教育和职官制度、中国的民俗文化、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化名人评价与欣赏、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化史 / 陈辉主编.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03-029098-4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文化史—中国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990 号

责任编辑: 张 展 张 涛 封面设计: 陈思思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9 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6 3/4
印数: 1—6 500 册	字数: 35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绪论

[内容提要]

绪论部分将从总体上对中国文化史的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和概要的分析，对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文化在物质、制度、行为和心态层面的特点。力求使学生对中国文化的相关概念、背景、特征有一个概貌的了解，明白学习中国文化史的现实意义，为下面各章的学习奠定基础。

第一节 中国文化的概念

一、文化与文明

(一) 文化的概念

文化一词由“文”与“化”组合而成，是“人文化成”、“文治教化”的简称。“文”原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脉络，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象征符号，又具体化为文书典籍、文章、礼乐制度等。“化”，指二物相接，其一方或双方改变形态性质，由此引申出教化、教行、迁善、感染、化育等含义。

关于“文化”最原始的提法见于《周易》“贲”卦《象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它的意思是，统治者通过观察天象，可以了解时序的变化；通过观察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脉络，可以用教育感化的手段来治理天下。综合古代文献中关于“文化”的论述，“文化”有三层含义：既是有别于自然现象的“天文”、“地文”的“人文”，又是有别于“武力加诛”的“文治教化”，还是有别于宗教神性“神文”倾向的“人文”倾向。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解释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言圣人观求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这里将文化界定为“诗书礼乐”，实际上是指的精神层面的东西。

西方的“文化”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 Culture。从字源上看，拉丁文 Culture 有多种含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可见，西方“文化”的含义比中国古代“文化”的含义要宽泛得多，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精神创造领域。基本含义为



通过人为的努力摆脱自然状态。

1871年,英国文化学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给“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这是西方关于(广义)文化的经典定义,在文化史的研究方面具有开先河的作用。

西方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行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种类动物的行为,是因为它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约。”^①亦即文化是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

从本质内蕴而言,文化是自然的人化,即自然没有而人类创造的一切。包括外在文化产品的创制和内在心智、德性的塑造。因此,广义的文化即指人类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人自身的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成果和现象的总和。而狭义的文化则指文化的精神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

(二) 文明的概念

与“文化”含义相近的词是“文明”。“文明”之“文”,指文采、文英、文华;“明”指开明、明智、昌明、光明。联合而成的“文明”,其意为:从人类的物质生产,尤其是对火的利用,引申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易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

西语“文明”一词,英语为 Civilization,法语为 Civilisation,德语为 Zivilisation,都源于拉丁文的 Civitas,主要指有组织的社会或城市国家的意思。

西方学术界对文明一词的含义有较多争议。但近几十年来,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文明是指较发达的、高级的文化形态。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或者说文明是文化的一个较高的发展阶段的产物,它是文化发展的进步状态。西方人文学界通常认为一种原生的文化进入文明阶段的标志有: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出现、金属工具的使用、宗教性建筑的出现等。近年来我国学者在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过程中也提出:文字、青铜器和都市为“文明三要素”,作为文明出现的标志^②。

因此,文化和文明作为人类现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命的一种独特的适应环境的方式。从历史角度看,文化与人类同时产生,有了人即有文化。而“文明”则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文明即指超越了蒙昧期和野蛮期的人类文化。与数百万年的人类文化史相比,人类的文明史只有数千年。本书重点关注的是中国文化在进入文明阶段之后的成果。

二、文化的结构

广义的文化含摄了人类一切的创造和成果,作为一个动态完整的有机系统,文化又由若干个子系统构成:

① 拉尔雯,比尔斯等.文化人类学.骆继光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1

② 孙进己,干志耿.文明起源和形成的理论研究(上).学习与探索.2002(5)



第三节 中国文化的特征

每一个民族的文化由于特定的地理历史背景，都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类型和特点。文化学上提出了“文化类型”的概念，用以分析不同文化的特质。美国学者司徒尔德 1955 年在《文化变异论》一书中提出，所谓文化类型是不同的民族文化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各种文化特质相互整合的核心特征丛；它不是全部的文化特质或文化元素的总和或集合，而是指那些有代表性的、具有因果联系的特征。也就是说，不同类型的文化是不同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的，深深地打上了环境的烙印，同时，它集中体现在该文化体系的某些本质性特征上。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考察中国文化的结构和特点，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有着鲜明的农业文化和宗法伦理型文化特征。

一、务实求稳的农业文化

如前所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产生的经济土壤。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前，农业生产方式就已在中国确立且不可逆转。中国是世界公认的农业起源中心之一。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农业显示出毋庸置疑的先进性。牛耕与铁犁早在春秋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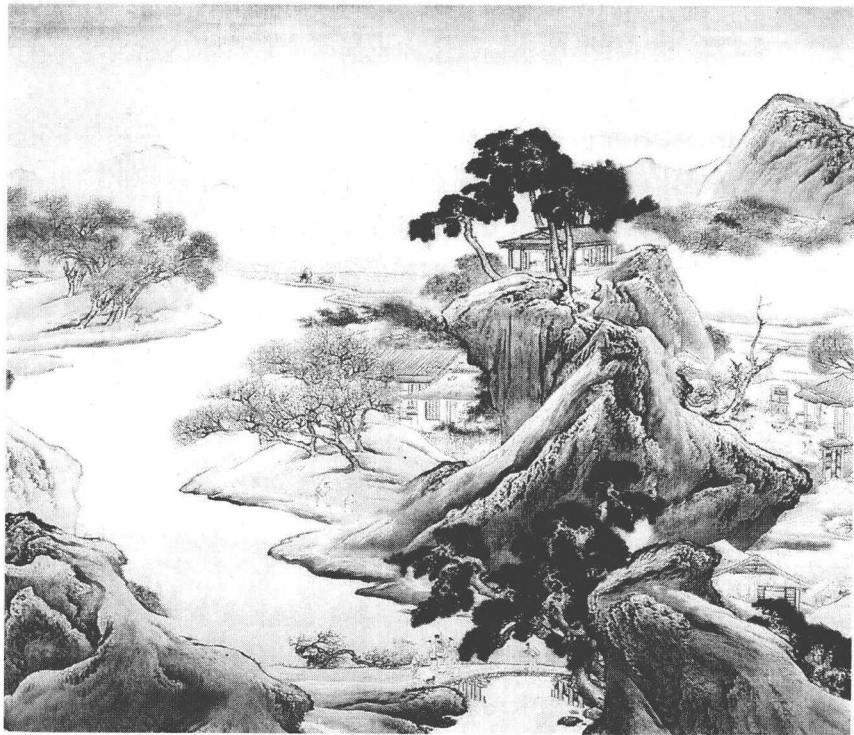


图 3 桃花源里耕读传家的生活是中国人的理想
(图据昵图网 <http://www.nipic.com/applye>)



既要源于人伦亲情，又要体现、维持上下、长幼、尊卑、亲疏的等级秩序。它是宗法文化在行为上的外化。

中国古代的礼制文化源远流长，完整成熟的礼制文化形成于西周。周礼包括吉、嘉、宾、军、凶五个部分，成为西周社会运行的重要依据。春秋之后，“礼崩乐坏”，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者承担起礼制建设的任务。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礼制文化得以在政治社会生活中重建。汉代以后，礼制文化的发展尽管有起有伏，但礼制精神始终清晰自然地展现于历朝政治制度、法律、伦理、风俗、艺术、文学之中，成就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形象。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的婚俗中的由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构成的“六礼”始于周代，虽然历代有过修改简化，但六礼始终是汉族婚姻礼仪的基本形式。又如中国古代都城和皇宫的建筑布局，一直沿用《周礼·考工记》中的规定。宫殿建筑前朝后寝、左祖右社、三朝五门的规制直到清代。

四、崇尚道德的伦理文化

所谓伦理即人伦之理，它是人际关系的自然之理。如夫妻、父子、兄弟之间的爱和长幼尊卑秩序。而“道德是维系和调节伦理秩序和个人行为方式，是个人的德操和社会的风尚。”^①道德包含了道与德，它源于天然的人伦之道、人伦之理，又体现于个人和群体对人际关系的自主调节。“得道于己之谓德”，“道能自守之谓德”。或者说，德是伦理的造詣。

奠基于传统宗法社会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心态层面突出地表现为伦理类型的文化。

伦理型文化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方面人伦效法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②；另一方面自然又被人伦化，“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③

体现在社会关系上，是以求善为特征的重德文化。“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性文化’，那么中华文化可以称之‘德性文化’”^④。实际上，中国文化重德，但并非轻“智”，而是主张德智统一、以德摄智。儒家认为个体生命的最高境界是成仁成圣，儒家哲学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哲学。“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⑤在社会生活中要以德律己，也要以德待人，与人为善。“缺德”是对他人最严厉的谴责。

体现在政治生活中，则是“以德治国”的德治主义传统，道德的威力始终被认为比法律更为重要和有效，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⑥源于伦常关系的“三纲五常”被政治化、法律化，不忠不孝被视为“大逆不道”。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传统的“治道”特别注重道德感化和身教

① 宋希仁. 伦理与道德的异同.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 2007(9)

② 道德经

③ 张载. 正蒙·乾称篇

④ 冯天瑜. 中华文化史.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232

⑤ 梁启超. 先秦政治思想史

⑥ 论语·为政



暇接。数量大、品种繁的中国青铜器无疑增加了鉴定的难度，这是中国青铜器的特点之一。

2. 分布地区广，且质量高、精品多

中国青铜器出土较为集中的地区是中原，但东北、西北、巴蜀、岭南甚至西藏及东海渔岛上都发现有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造型生动、精美，风格各异，呈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中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制作精湛、形状瑰异、花纹随意、富丽典雅，其精品不胜枚举，如司母戊方鼎、虎食人卣、双羊尊、大克鼎、毛公鼎、莲鹤方壶、双雄宝剑、勾践剑、长信宫灯、嵌绿松石卧鹿、铜车马一流，铸造精致，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感染力，这是国外青铜器铸品望尘莫及的。

3. 铸刻有铭文

古代青铜器铸刻有铭文，这是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青铜器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铭文又称为金文、钟鼎文。古人认为，青铜器非常坚固，在上面雕刻文字可以流传不朽，所以需要长期流传的事情，必须铸刻在青铜铭文之上。因此，从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内容多记奴隶主贵族的祭典、训诰、征伐功绩、赏赐策命、盟誓契约等。纵观世界各地古青铜器，绝大多数没有铭文，只有印度出土的少量青铜器或铸有很短的铭文。中国古铜器有铭文者仅出土的就达一万余件，且铭文长篇巨制不少，如毛公鼎铭文长达 497 字。这些铭文字体，或粗犷放达，或苍劲有力，具有很高的书法欣赏价值。铭文也成为今天研究古代历史、艺术的重要材料。

4. 以容器为主，武器与工具较少

就世界范围而言，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米诺斯文明到迈锡尼文明，其青铜器的代表作大多为武器，如戈、矛、刀、箭、剑、戟、镞等，而中国却以铸造难度较大、纹饰复杂的容器为主，且多为礼器，是宗法礼制的物化表现，这是因为在奴隶制社会中，青铜礼器被统治者用来祭天祀祖、歌功颂德、宴飨宾客，同时它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陪葬品等。可见，青铜礼器在我国早已被权力化、制度化、神秘化了，它早已不是一般的实用器了。尤其鼎，是国家重器。其寓意深奥、内涵丰富。可见，欧洲青铜文化以武器为代表，中国青铜文化以容器为代表。

二、古代青铜器的类别

中国古代青铜器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工艺精美，从功能上可大体分为四类：

（一）青铜礼器

青铜礼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于祭祀、宴飨、朝聘、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的用器，用以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是立国传家的宝器。青铜礼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乐器四个大的门类。

1. 食器

青铜礼器中的食器主要有鼎、鬲、甗、簋、簠、盨、敦、豆等。



眼长 3.3 米，鼻长 5.6 米，嘴长 3.3 米，耳长 7 米。脚背上可站百余人。自开元初年至贞元十九年（公元 713~803 年），历时 90 年才完工。这两部分的石刻精品都堪称世界艺术的瑰宝。

一、陵墓石刻艺术评价与欣赏

中国古代自商周起逐渐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陵寝制度。陵墓石刻就是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

一般帝王陵墓规模都较宏大，修建时间也比较长，花费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为了显示帝王的权威和地位，陵墓在修建时就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王权的威严。陵墓石刻作为陵墓中最精彩、保留时间最长的一部分可以分为两类：地下和地上石刻。

地下石刻为墓室内实用性和装饰性石刻，如汉代的画像石即作为墓室构件嵌置于墓门及四壁上面，刻有内容丰富的各种图画，主要在墓葬中用来装饰和祈愿，或者叙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其题材非常广泛，如描绘神仙、东王公、西王母，还有宾客图、出行图，以及狩猎、喂马、拾粪等生活内容的，都刻画得非常生动。还有石棺、石槨等葬具，除了本身具有艺术性的造型外，还刻有各种图案装饰。这些画像石及各种刻饰多采用减地平雕及线刻的手法镌刻精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及装饰效果。

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园、墓葬前的仪卫性和纪念性石刻。仪卫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两侧按一定的规制置放的石人、石兽等起着保卫及仪仗作用。纪念性石刻则是为了纪念某个事件而专门雕刻的，如唐太宗昭陵墓前雕刻的“昭陵六骏”等。这些石刻体量硕大、造型生动，威严肃穆。

据史料记载，陵墓石刻在西周时就已出现，但汉之前遗留下的实物不多。汉以后逐步大量出现，盛于唐，清代衰落。汉代帝王陵墓目前没有见到石刻遗存，而达官贵人的墓上则多见之。虽说陵墓石刻多出现在帝王陵墓上，但是汉以前帝王陵墓石刻遗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所出现的最具中国本土艺术特色的陵墓石刻在汉武帝时的大将军霍去病的墓旁（详见本章“作品赏析”部分）。

中国的陵墓石雕在东汉时期一度盛行，但由于三国及两晋时期连年战乱及为防止盗墓而在上层社会中流行了薄葬制度，帝王诸侯陵墓前的雕像石刻极少。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相对稳定，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使追求奢靡之风再次泛起，帝王诸侯纷纷大肆修建陵墓，这也使得陵墓雕刻又一次成为社会的风尚，作品的艺术水平也较之以前有了新的发展。南北朝的陵墓雕刻成为中国古代雕塑史上重要的一部分。

南朝陵墓石刻中，大都是南朝皇帝和王侯陵墓前的神道石刻。神道即墓道，意为神行的道路。设立在神道两侧作为陵墓标志的石刻，便称神道石刻。

陵墓大多取坐北朝南方向，石刻距陵墓约千米左右，由于神道石刻只有帝王和王侯才享有，因此神道石刻往往雕刻精美，形制巨大，是权贵的象征。一般都包括镇墓神兽、神道石柱、神道碑等几种。镇墓神兽分三种：天禄、麒麟与辟邪。天禄顶部雕饰双角，麒麟为独角，而辟邪则无角。三种石兽形态基本相似，均体形高大，昂首挺胸，口张齿露，目含凶光，腹部两侧刻有双翼，四足前后交错，神态威猛庄严，给观



了更加完美的艺术样式。

五代前蜀主王建陵刻有他本人的石刻像，并附有彩饰，石刻基本上还原了生活的原貌。王建的石刻像虽说艺术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这尊像却是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惟一的一座雕刻真实人物的作品。

帝王陵墓石刻艺术发展到北宋，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建制继承唐代，只是坟墓建在平原，用土堆砌而成。在神道石刻数量上增加了“大象和石羊”，其神道石刻排列顺序为：华表、大象及驯象人、瑞禽、角瑞、鞍马与牵马人、蹲虎、石羊、外国使臣、文武侍臣、石狮、守陵将军、宫人、内侍等。另外陵区东、西、北三门外还有石狮，因此陵墓上的石刻总数达 58 件，规模不及唐帝陵（石刻数量和部分唐帝陵基本相同），艺术水平也大大逊于唐代。

北宋 9 位皇帝的陵多在河南的巩县一带，永昌陵是宋太祖赵匡胤的陵，应该说是宋陵的早期代表，风格比较简练。中后期的永厚、永裕、永泰陵的石刻比较繁琐、生活化很明显。宋陵石刻总的风格是“孱弱无力，造型处理琐碎，缺乏宏伟、刚劲之美。人物缺乏内在精神，衣饰繁缛。动物雕刻更是绵软，狮子、老虎虽张大口而无威，体形硕大而无力量，没有威猛的气概”。中国古代陵墓石刻到北宋时期已开始走下坡路，并凸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宋真宗赵恒永定陵的石刻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宋真宗时北方的“辽”一直虎视中原，常有侵犯。一次宋军在澶渊与辽军决战，宋军大胜，但是宋真宗胆小怕事，与辽签订了赔款条约，即《澶渊之盟》，当时举国悲痛。这种受辱而痛苦的心情在宋真宗陵墓石刻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所有的石刻无论人物还是动物表情都呈哀愁痛苦之状，这是当时民意的真实写照。

南宋时没有留下帝王陵墓石刻，主要原因是南宋的帝王们都梦想着恢复大宋江山，之后再迁回北方祖陵，所以葬礼极简。

元代建都北京，历代帝王死后都运回蒙古原籍安葬，没有留下多少石刻遗迹。明代的帝王陵墓石刻留下的遗迹较完整，规模比较大，风格也比较接近于宋代，但艺术性却不及宋。明代帝陵有两大特点，一是明孝陵的神道最具独特性。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在南京中山门外钟山西麓，依山为陵，坟墓是人工用土砌成。明孝陵的神道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中是最为特别的，其平面布局不同于以往的直线设计，而是由巫师占星而定，其状仿北斗七星座。先东西向，又转南北向，再向东，最后又从南北达陵前的内陵享殿。明孝陵神道石刻在宋的基础上增加了獬豸和骆驼，但没有虎、羊和瑞禽。排列顺序为：华表、石狮、獬豸、骆驼、大象、麒麟、翼马、文武侍臣等，其中所有瑞兽都是一对站一对跪卧，石刻总数达 34 件之多，规模和前朝相比小了许多，但体量比前朝的石刻大得多，唐宋时的外国使臣及宋帝陵的守陵将军、宫人、内侍等都没有出现；第二个特点是北京的 13 个帝陵只有一个神道，它们共用明成祖长陵前的神道，所用石刻形制、数量与孝陵相同，只是体量较小，风格浮华，变化繁琐。

总体而言，明代的陵墓石刻风格为：“华而不实，缺乏内在的精神气质。做工过于灵巧细腻，追求华丽精细强调工艺性；注重细节的华丽，忽视了整体精神的刻画，石刻显得轻巧，没有表现出石材的厚重之感；也没有威严感和恢弘的气势。更加世俗化、生活化，刻意模仿前人风格，只追求唐人的规模，宋人的奢华，而缺乏艺术的内在精



都追求自然之美。园林的山、水、植物都力求展现其天然意趣，山水、植物、建筑的关系也是因地制宜，符合其自然状态，而其表达的意境则源自对自然的深远的感受。园林是一种人工建筑，但它的最高境界是宛自天成、没有人工斧凿的痕迹。古典园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和特点是有限的景色和空间表达无限之美。尤其私家园林，造园者通过因景、借景、对景、隔景、障景、框景、漏景等丰富的构景手法，巧妙地处理内与外、远与近、虚与实、大与小、有限与无限的关系，让园林内部有隔有连，整体贯通而又层次丰富，同时园林又通过借景做到内外呼应，把远处的景色纳入园林的观赏视线，力图在方寸之地，展现大自然的无限美感。

中国古典园林按其艺术风格可分为江南园林、北方园林和岭南园林等主要类型。其中北方园林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以皇家园林为主。其特点是真山真水、气魄宏大。许多皇家园林是临仿各地名园和名胜的作品，并且借鉴了西方的建筑艺术（如圆明园），因而在风格上具有兼采南北、融会贯通的特点。北方园林中现存的代表作品有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北京北海等。江南园林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的苏州、无锡、扬州、杭州、南京、镇江、上海等地，尤以苏州园林最具代表性。江南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中艺术造诣最高的类型，其艺术风格素雅空灵，空间有限但并不局促，小巧玲珑而又以小见大，花木葱茏、诗情画意。江南园林的杰出代表有苏州拙政园、留园、狮子林、沧浪亭、网师园、环秀山庄，扬州的瘦西湖、上海的豫园等。岭南园林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香港、澳门等地，其中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佛山十二石斋、番禺余荫山房被称为岭南园林的四大名园。

第六节 中国古代文房四宝评价与欣赏

在我国，古人将书房称为“文房”，而笔、墨、纸、砚则被誉为“文房四宝”。在用于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工具中，仅这四样宝，就已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可以说，文房四宝是中国独具特色的文书工具。

一、“文房四宝”之“笔”

在众多笔类制品中，毛笔算是中国独有的品种。最早的毛笔，大约可追溯到两千年之前，湖北曾侯乙墓出土了春秋时期的毛笔，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毛笔实物。毛笔之源一般人都以为是秦代的蒙恬，但考殷墟出土之甲骨文上所残留之朱书与墨迹，系用毛笔所写，由此可知毛笔起于殷商之前，而蒙恬只是改进了造笔的方式而已。西周以上虽然迄今尚未见有毛笔的实物，但从史前的彩陶花纹、商代的甲骨文等上可觅到些许用笔的迹象。

（一）笔的种类

笔之种类甚多，现在所使用的，以紫毫、狼毫、羊毫及兼毫最为重要。



点评：湖笔的发源地在湖州的善琚镇。在当地有笔祖蒙恬庙，相传秦始皇的大将蒙恬“用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外衣）”，发明了毛笔。湖笔选料精细，制作精湛，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被书画家誉为“笔颖之冠”。湖笔的主要原料是山羊毛、野兔毛、黄鼬尾毛，其中以纯、净、空、宿为上品（如图1-24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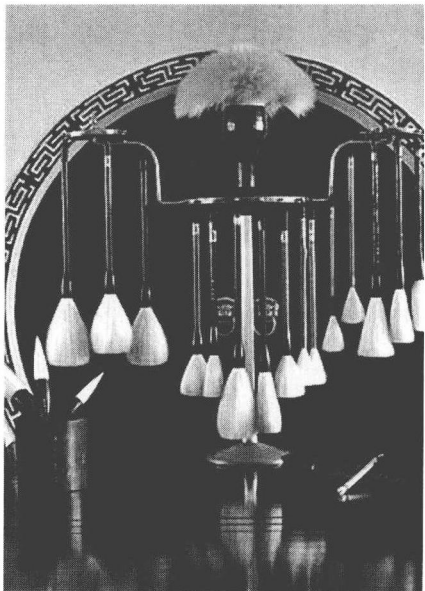


图1-24 笔中之冠——湖笔

点评：兽面纹旧称饕餮纹。饕餮之名出自《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向，以言报更也。”人们把饕餮幻想为睁着眼、张着嘴的凶物，从此，它就以此种面貌出现。铜器上，特别是铜器中的礼器多饰饕餮纹，一方面为祭祀鬼神，另一方面也表示求佑与去邪的双重愿望。

饕餮纹取材于虫、鸟、兽等各种现实动物，多施加在器物的主要装饰部位，以柔韧的阴线刻出，或作阳线凸起。构图丰满，主纹两侧以富于变化的云雷纹填充，具有阴阳互补之美。饕餮纹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前期，到东周以后再度流行，但已失去原先的主导地位和狞厉色彩，而成为华美的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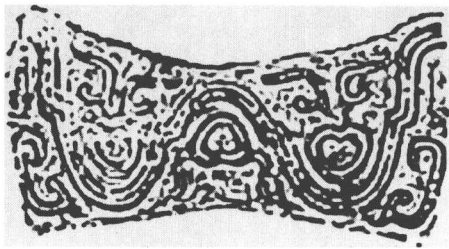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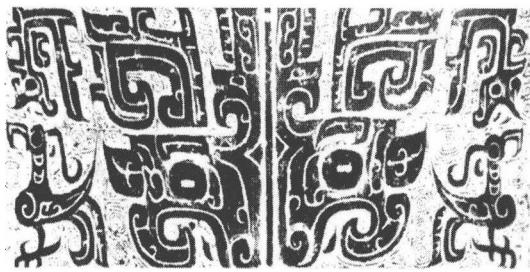


图1-25 兽面纹

兽面纹是青铜器上最具特色的装饰纹样，在商和西周时期最普遍而典型，艺术效果也最强烈。兽面纹主要的装饰对象是鼎，兽面纹大都以夸张的兽面、简洁的线条来修饰青铜礼器，在庄严雄强中又显示出一种华丽和高贵的气质。兽面纹的特点是以鼻梁为中线，两侧作对称排列，上端第一道是角，角下有目，形象比较具体的兽面纹在目上还有眉，目的两侧有的有耳，多数兽面纹有曲张的爪，两侧有左右展开的体躯或兽尾，少数简略形式的没有兽的体部或尾部。所有兽面纹基本上是按这一模式塑造的（如图1-25所示）。

李泽厚先生曾经说过：这些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恐怖动物形象，在静止状态中积聚着紧张的力，好像在瞬间就会迸发出凶野的咆哮，体现了早期奴隶制社会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具有“狞厉美”。^①

① 李泽厚. 美的历程. 天津: 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48



点评：击鼓说唱俑，灰陶制，高55厘米，东汉时期作品，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击鼓说唱俑是陪葬俑中少有的传神佳作。它代表了东汉陶俑的平实感人的生活气息和艺术风格。

该俑席地而坐，上身光赤，下身着长裤，赤脚，额前布满皱纹，双眼眯缝，左手抱鼓，右手握棒前伸，大腹凸出，右足翘起，好像正说到精彩处，手舞足蹈，眉飞色舞，一副幽默滑稽的样子，使观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此俑造型手法熟练，朴实无华，丑中见美，形体动态略加夸张，面目表情生动传神，这件陶质雕塑作品，堪称汉代陶俑中的杰作（如图1-33所示）。



图1-33 四川击鼓说唱俑

点评：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在内容上表现了骠骑大将军北击匈奴的功绩，同时也展现了祁连山独特的地域环境和艰苦的战斗场景。冢和石刻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纪念碑，充分表现了骠骑大将军辉煌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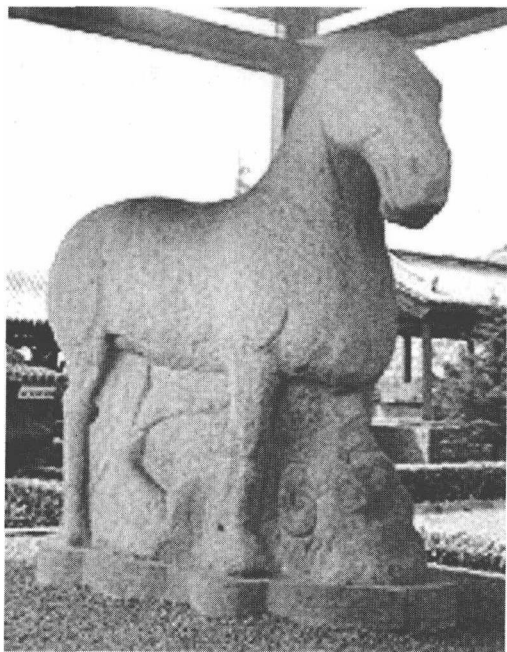


图1-34 马踏匈奴石刻

最具纪念意义的作品为“马踏匈奴”，是一尊具有政治意义的作品（如图1-34所示）。一匹站立着、微张着嘴，目光炯炯有神，目视远方，完全是一个胜利者的姿态。马的身下，一个匈奴将领仰面于地、表情沮丧。西汉富有才华的艺术家们，巧妙地将失败者的身体置于马之腹下，填充了空隙，使雕塑更加威严、坚实。霍去病墓前的这组石刻，给人以“雄浑厚重、造型古拙、形象生动之感；其手法简练而气势恢弘，充满了博大之力量和深厚的内在精神；追求自然美、意象美”。

霍去病墓前石刻的艺术风格，奠定了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风格特征：“对线之敏锐，运用之灵活生动；同时更注重线与形体的结合；线与体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更加完美”。这些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



时代人们认知的局限性有关，同时也是人们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主客观需求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黄帝擒蚩尤等故事。

古代神话传说的一些幻想、解释和描述，在我们今天看来不免荒诞可笑，但绝不是远古时代人们纯意识和心理的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社会生活的反映。比如，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故事，就明显地反映了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决意志。

神话传说中还把无数劳动人们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总结、集中，创造了不少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如伏羲、神农、黄帝、嫫祖、仓颉等，把各种创造发明都归功于他们，再用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使社会不断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这就是神话的积极意义。如后羿射日的故事，实际上就含有歌颂劳动英雄的意义，也有赞扬优良的劳动工具和巧妙的劳动技术的意味。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着力描写的众多英雄形象显然深深地烙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同时也掺杂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如传说中的关于治水的鲧、禹父子与祝融、共工之间的杀戮。因为鲧之被杀，正是最高统治者同人民的对立以及地上王权——奴隶主的权威日益提高的反映。

此外，古代神话传说在今天看来仍有积极意义。例如，《述异记》中称盘古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等传说，表现了原始人类的朴素唯物思想——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物质变化而来的。又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天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表现了阶级社会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叛逆精神。

古代神话传说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它对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有着积极的影响。神话传说的那些曲折离奇的情节、无所不能的人物形象、自成体系的“世界格局”等，启发了后世艺术的想象力，丰富了后世艺术的题材和形象。例如，屈原的楚辞，庄子的散文，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等的诗歌，特别是小说戏剧如《柳毅传书》、《张生煮海》、《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鲁迅的《故事新编》等都与我国古代神话有着无法割舍的联系。尤其重要的是，古代神话中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对艺术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诗歌

1. 什么是诗歌

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艺术形式中分化出来的。它以丰富的想象、高度凝练而富有节奏感和韵律美的语言来反映社会生活、抒发情感。

中国古代诗歌的分类，根据音律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类（这是唐代形成的概念）；按内容和表达方式来分，可分为叙事诗、抒情诗、送别诗、边塞诗、山水田园诗、怀古诗（咏史诗）、咏物诗、悼亡诗、讽喻诗等。

我国真正原始形态的诗歌，由于年代久远，加之当时还没有文字，后代流传下来的极少。但是，从后世的古籍资料整理中，我们还是可以有些收获。例如，汉代人赵



青海大通县孙家寨墓地发掘出一个新石器时代的舞蹈纹陶盆（如图 2-1 所示）。陶盆内壁绘有三组舞人形象，每组五人，面部及身体稍侧。他们手牵着手，整齐地一起踏舞。陶盆上的舞人，头上有斜着下垂的发辫或饰物，身后都拖了一个小尾巴，这应是扮鸟兽的装饰。这是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舞蹈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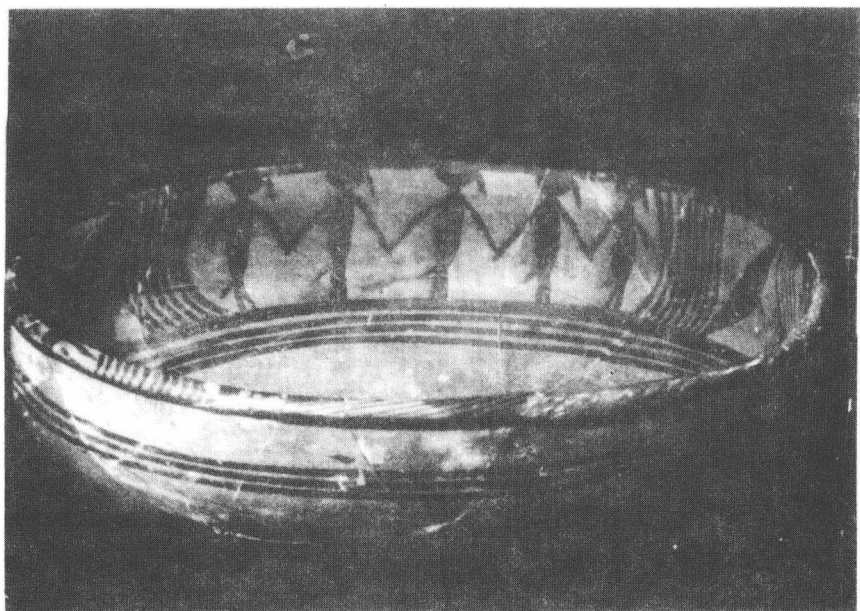


图 2-1 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

近年来，乐律学家根据一出土的新石器晚期（公元前 2000 年）的二音孔陶埙（如图 2-3 所示），推论当时在乐律上已经形成四声音阶；根据商代的五音孔陶埙测音，发现陶埙能发八个连续半音。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商代后期人们已经掌握了 12 律的乐律知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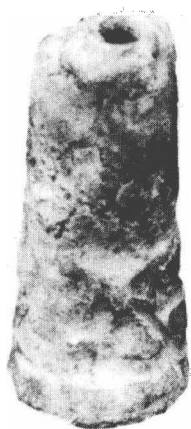


图 2-2 新石器时代的陶埙，一个吹口孔



图 2-3 新石器时代的陶埙，二个吹口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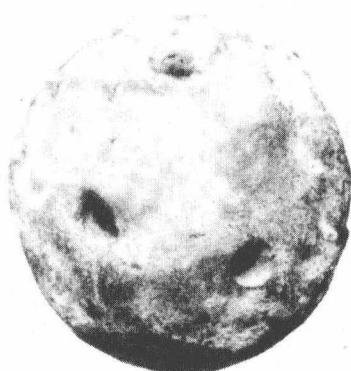


图 2-4 新石器时代的陶埙，三个吹口孔



汉魏歌舞的繁荣，在东汉傅毅的杰作《舞赋》中有生动的描绘。

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舞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特征，为唐代乐舞的高度繁荣准备了条件。

四、隋唐时期的音乐舞蹈

统一的隋唐迎来了诗、乐、舞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唐朝，政治稳定，经济高度发展，勇于吸收外域文化，达到了诗、乐、舞繁荣的高潮。

隋唐时期，“燕乐”（统治阶级用于宴会中间的一切音乐，也称宴乐）盛行，这种音乐源于汉族传统音乐和汉魏以来外域音乐的融合，具有继承性和兼容性的突出特点。宫廷燕乐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的最高成就。

隋初的“燕乐”为《七部乐》，即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隋炀帝时经整理，增加康国、疏勒，定为《九部乐》。到唐太宗李世民时，又增高昌乐，成为著名的《十部乐》。每部使用的乐器不完全相同，并有不同的歌舞。到了唐玄宗时，又根据表演方式的不同，分音乐为《立部伎》（室外表演）八部和《坐部伎》（室内表演）六部。坐部伎的演奏员水平高于立部伎。

歌舞大曲是唐代燕乐中的突出代表，是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在一个整体中间连续表演的一种有多段结构的艺术形式。《大曲》中有一部分叫《法曲》。《法曲》的主要特点是：其曲调和所用乐器接近汉族的《清乐》系统，较优雅。唐代有名的《霓裳羽衣曲》就是“法曲”中的代表。

唐代的音乐机构规模空前，有大乐署、鼓吹署、教坊和梨园四个部门，造就了一大批像李龟年、李鹤年、段善本、康昆仑、曹纲、裴兴奴等才华出众的音乐家，他们对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唐代乐器，约有三百种。其中琵琶、笙、笛、羯鼓等乐器，在《燕乐》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还出现了轧筝和奚琴等两种早期的拉弦乐器。曹柔新创了减字谱的古琴曲记谱法；还出现了与今天的大调音阶完全相同的“新音阶”；有了八十四调和燕乐二十八调的理论；出现了工尺谱和舞谱。

隋唐时期，有关音乐的专门著述大量增加。在音乐思想方面，以隋高祖及牛弘、唐长孙无忌及杜佑为代表的“雅乐派”主张复古，不赞成“新变”；而白居易和元稹的音乐思想则更具有进步意义。

唐代各类乐舞中较为流行的舞蹈有：《九部乐》和《十部乐》，《坐部伎》和《立部伎》，《健舞》（如《胡旋舞》、关盼盼的《柘枝舞》和公孙大娘的《剑器舞》）和《软舞》（如民间最流行的《绿腰》舞，如图2-6所示），还有流行于民间的集体舞——踏歌等。



笔画减省，体势连绵，笔意奔放，人称“一支笔”，加之其笔力纵横驰骋，变化无穷，故张芝被誉为“草圣”。今草经东晋王氏父子的进一步变古创新，更加成熟和完善。王氏父子的今草，笔姿娇逸、体态秀婉、风格清新，其书法善将情感流露于笔画之中，书情并茂，为后人所钟爱、效仿，王羲之也被尊崇为“书圣”。

今草的遗作十分丰富，主要的作品有：晋王羲之的《十七帖》、隋智永的《千字文》、唐孙过庭的《书谱》、唐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及宋米芾的《草书九帖》等。

今草发展到唐代，张旭承今草之法，扬“一笔书”之意，创立了一种笔法放纵、笔画减省、书写快捷、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新书体——狂草。狂草是今草进一步艺术化了的表現方式，常常一笔数字，连绵不绝，恣肆放纵，形状奇丽，难以辨认。狂草的代表作主要有张旭的《古诗四帖》、怀素的《自叙帖》、黄庭坚的《诸上座贴》等。

3. 楷书

楷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正楷和真书。楷书可作为习字的法式楷模，所以叫楷书，是在汉隶基础上省改波磔、增加钩挑而成的一种书体也叫“正书”、“真书”。楷书由汉隶蜕变而来，所以历史上还称它为“今隶”。至三国魏钟繇和晋王羲之，进一步规范体势，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书体。

和隶书比较起来，楷书的线条更平直，而字形定型化则得到进一步加强。具体说来，汉隶的笔势大多是扁方开头向外摊开，而楷书笔势则大多是长方形状，向内集中。汉隶的用笔大多带有波磔，粗细变化很大，而楷书用笔要么比较平稳，要么出现硬折，粗细变化相对少。楷书具有严格法则、十分规范的文字形式，如讲究“永字八法”等。

楷书史上出现了各种各样楷书书体，如魏体、欧体、褚体、颜体、柳体、瘦金体、赵体等等。所谓“魏体”，是指北朝元魏时石刻、摩崖、造像石上的书体，又称“北碑体”或“魏碑体”。魏体体态多变，而以方正凝重为主，是隶楷变法时期的一种重要书体。“欧体”是唐代欧阳询所创的楷书书体。“褚体”是唐代褚遂良所创的楷书书体。“颜体”是唐代颜真卿所创的楷书书体。“柳体”是唐代柳公权所创的楷书书体。“瘦金体”是宋徽宗赵佶在唐人薛稷楷书书体基础上所创的楷书书体。“赵体”是元代赵孟頫所创的楷书书体。在众多的楷书书体中，以欧、颜、柳体最为突出，是楷书的三个杰出代表。

4. 行书

行书，又称“行押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因此又可以说它是楷书的草化或草书的楷化。行书是日常最常用的一种书体。唐人张怀瓘说：“不真不草，是曰行书。”事实上，行书正是为了补救草书难以辨认和楷书书写太慢而产生的。东汉末年，草书和楷书盛行，行书一方面接受草书的影响，但又纠正草书的漫无标准；一方面接受楷书的影响，同时又避免楷书的书写费力。行书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发挥两方面的优点。

行书是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书体，若草书成分多的，也可叫作“草行”或“行草”；楷书成分多的，也可以叫作“行楷”或“真行”。清人刘熙载《艺概》说：“行书有真行，有草行。真行近真而纵于真，草行近草而敛于草。”

晋代是行书的繁荣时期。王羲之父子精研行书，不仅使行书发展到成熟完善的程度，而且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王羲之的得意之作《兰亭序》更是尽善尽美，被誉为



下的民族、国家宗教不一样的特点。

中国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四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先秦哲学、两汉经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先秦哲学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这一时期的哲学。在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产生了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各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儒、墨、道三家。先秦儒家思想奠定了整个儒家学说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奠定了中国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定义、特征及主要经典

（一）儒家思想的基本内涵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中国整个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处于一个主体的地位。从历史治国的理念、政治制度的构建，以及人身修养、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些方面来看，儒家思想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主干。儒学是一个思想的大系统，一个信仰的体系，其内容包括了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宗教，但又不能将它简单归结为哲学或伦理学或政治学或宗教，而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问。儒学既有哲学的深思，又有信仰的引导；有哲学有宗教，而又超越于二者。它是为中华民族确立精神方向的学问，不是一般学术可比拟的。儒学的核心思想可称之为“仁和之学”：以仁为体，以和为用；以生为本，以诚为魂；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它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宽容包容精神、理性通达精神、中和协调精神。它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品格，绝少极端主义发生，也使得众多的思想学派和宗教，包括外来的学术和宗教，得以在中国生存与和平发展，形成中国文化多元通和的文化生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已内化为一种人文品格，深深地积淀在中国人的精神血脉之中。

（二）儒家的特征及主要经典

儒家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其二，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其三，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其四，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儒家经典主要有儒学十三经。儒家本有六经，《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秦始皇“焚书坑儒”，《乐经》从此失传；东汉在此基础上加上《论语》、《孝经》，共七经；唐时加上《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尔雅》，共十二经；宋时加《孟子》，后有宋刻《十三经注疏》传世。《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后来的《四书》是指《大学》（《礼记》中一篇）、《中庸》（《礼记》中一篇）、《论语》、《孟子》，五经则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四书”、“五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三、道教的主要门派

道教产生初期即分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魏晋南北朝后“五斗米道”也分为两部分，北方出现了由寇谦之改造的新天师道及由此演变而来的楼观道，南方传统的天师道继续流传，同时出现了上清派与灵宝派，等等。总的来看，道教主要派别有：

1. 上清派

上清派约形成于东晋时期，以专门传播习炼《上清经》而得名。上清经是由《黄庭经》、《大洞真经》而衍生出的道经系列。在上清派发展史上，发展和传播上清经系的主要是杨羲等人。上清派强调，人体内精气神的修炼，不重符箓、炼丹。该派开创人物认为依上清法修行得道，即可升入“上清”，比天师道的“太清”更高。上清派的开创人物均为士族出身，和统治阶级上层有密切联系，反映了民间道教向士族道教发展的变化。陶弘景以后，茅山宗代替了上清派。

2. 灵宝派

因传授洞玄灵宝部经而得名。形成于东晋时期，奉葛玄（公元164~244年）为祖师，道门人士尊称为太极葛仙公。相传由葛玄传于郑隐，由郑隐传于葛洪。该派将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修道方术结合起来，修炼方式崇奉符箓，注重斋醮。受上清派影响，也讲究思神、诵经，轻视金丹与房中术。适合社会中上层人士的口味，故在南方传播较广。宋元时期，该派以江西清江县阁皂山为本山，号称阁皂宗。元代以后此派逐渐与龙虎山正一派融合。

3. 楼观道

楼观道是在北魏寇谦之改革天师道之后在北方兴起的一个道教派别。以尹喜为祖师，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因以陕西周至县楼观为活动中心而得名。坚信老子化胡之说，修炼方式杂采众家，符箓与丹鼎并重，尤其喜服丹药。楼观道从北魏开始逐渐有了影响力。隋朝到唐朝初年，进入鼎盛期。尤其在唐代，由于楼观道士在李渊起义时进行了资助，受到了李渊的看重。安史之乱后，楼观道逐渐衰落。元代以后，合并入全真道。

4. 茅山宗

茅山宗是以茅山（江苏句容）为祖庭而形成的道教派别。它宗承上清派，是上清派以茅山为发展中心的别称。它的实际开创者是南朝齐梁时期的陶弘景。当时茅山已成为道教上清派的中心，后来上清派即被称为“茅山宗”。该宗奉元始天尊为神灵，以《大洞真经》和其他上清经为经典，修炼方式以存神为主，以诵经、修功德为辅。陶死后，该宗传入北方，成为隋唐时期道教的主流。

5. 正一道

原称天师道、五斗米道。元以后，由南北天师道和上清派、灵宝派、茅山派等符箓派合并而成。与全真道同为道教主要的两大派。正一道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崇拜鬼神，画符念咒，降神驱鬼，祈福禳灾。正一道以张天师为道首，其道士可以不居宫观，可以结婚。